

Unreliable Narration and Masculinity Construction in McEwan's *Unbearable Love*

JIANG Zhaoxia

Nanjing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November 6, 2023

Accepted: November 20, 2023

Published: March 31,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JIANG Zhaoxia. (2024). Unreliable Narration and Masculinity Construction in McEwan's *Unbearable Lov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1), 062–069, DOI: 10.53789/j.1653–0465.2024.0401.007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4.0401.007>

Abstract: *Unbearable Love* is one of McEwan's most suspenseful novels. Its suspensefulness largely comes from the novel's diversified narrative strategies, like embedded narrative multi-angle focusing, and so on. Besides, the diversified narrative strategies are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ero's masculinity, for the hero/narrator's narrative authority, is constantly challenged by the self-narration of the hero / narrator experiencing the accidental event in the novel, as well as the other two kinds of focused narrations. Hence, the narrator/hero's masculinity is constantly questioned and challenged by these multi-angle unreliable narrations. The hero's masculinity is finally secured by the novel writer's intervention with an authoritative medical narrative. This transformation from unreliable narrative to authoritative narrative is also McEwan's experimentation with the multi-layered functions of unreliable narrative in the artistic form of the novel.

Keywords: *Unbearable Love*; unreliable narrative; embedded narrative, focusing; masculinity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JIANG Zhaoxia, female, born in Linyi, Shandong Province. She is a doctoral student at Nanjing University, and a lecturer in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r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Her email address is 66256526@qq.com.

麥克尤恩《愛無可忍》中的不可靠敘述 與男性氣質的建構

薑兆霞

南京大學

摘要:《愛無可忍》是麥克尤恩最具懸疑氣氛的小說之一,其懸疑氣氛與文本中的多種敘事策略,如嵌入式敘述和多角度聚焦等密不可分。同時,多種敘述策略的運用又與主人公男性氣質的安危息息相關。男主人公作為小說的敘述者,其自身的敘述權威受到同為故事親歷者的自我敘述以及小說中另外兩種聚焦敘述的挑戰,其男性氣質的重建也由此受到多重不可靠敘述的質疑與顛覆。主人公男性氣質的最終建立得益於小說作者權威醫學敘述的干預。從不可靠敘述到權威敘述,麥克尤恩再次探索了不可靠敘述在其小說藝術表達中的多層功用。

關鍵詞:《愛無可忍》;不可靠敘述;嵌入式敘述;聚焦;男性氣質

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的《愛無可忍》(*Enduring Love*, 1997)自發表以來一直是作者最具懸疑氣氛的代表作之一,備受評論界和讀者的喜愛,小說還於2004年被改編成電影。與此不相稱的是,小說作為展現麥克尤恩敘述藝術的代表作品,其中的敘述策略卻受到了研究者一定程度的忽略。近年來,隨著後經典敘事學的發展,小說中變換跳躍的敘述視角以及迴圈間雜的敘事結構引起了敘事學家們的濃厚興趣,在敘述者的可靠性、讀者的認知判斷、倫理主題探尋等方面都出現了一批富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如詹姆斯·費倫(James Phelan)在2009年的國際期刊《文體》(*Style*)上發文從修辭敘事學的角度重新解讀了《愛無可忍》中的後現代敘事技巧。黃一暢則進一步重申了小說中的多重聚焦和自反結構,將不可靠敘述與敘述者的創傷記憶和敘述記憶相勾連。^①馬修斯(Sean Matthews)指出《愛無可忍》中有七種不可靠敘述,並借助這些不可靠敘述的分類依次審視了主人公喬·羅斯的專業知識的可靠性、對自我認知的可信性等問題。馬修斯認為喬是一個非常有控制欲甚至比他自己想像中更著迷於控制他人的人。^②海德(Dominic Head)經過分析小說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得出小說意欲追求的是「一個協商後的故事,或者,換句話說,一種協議後的道德準則——儘管讀者知道這個故事是假的。在這裏,小說成為人類道德的代言,發揮了它的社會功用」。^③可以說,小說自始至終的懸疑氣氛與文本中的多種不可靠敘述策略,如嵌入式敘述和多角度聚焦等是密不可分的。

評論界還探討了《愛無可忍》中的其他主題,理性主義就是其中的一個。莫裏森和戴維斯(Morrison & Davies)對喬的理性持否定態度,認為喬是借助理性建構了他自己的男性話語霸權和身份,馬兒科姆和蔡爾茲(Malcolm & Childs)則認為小說的目的是為理性做辯護,故事的發展也證明了理性的喬最終是正確的。^④本文意在重新探究小說中各種敘述策略的運用與主人公(即敘述者)男性氣質的重建之間的關係。小說中的嵌入式敘述和不斷變換的敘述視角一方面呈現了喬的男性氣質危機,同時又展示了喬如何借助這些敘述

策略以及作者麥克尤恩的科學敘述重建其自身男性權威的過程。《愛無可忍》中的不可靠敘述策略由此被賦予了深刻的主題意義。

一、氦氣球事件的嵌入式敘述

敘事作品中的敘述者基於不同的標準,其內涵差異也極其巨大。按照敘事者是否參與故事可以分為同故事敘述者(homodiegetic narrator)和異故事敘述者(heterodiegetic narrator);根據敘述者與隱含作者之間的關係可以分為可靠的敘述者(reliable narrator)與不可靠的敘述者(un-reliable narrator)。艾倫·帕爾默(Alan Palmer)在其2004年的專著中主要討論了異故事敘述者,指故事雖然使用了嵌入式敘述,但敘述者並不是故事中被敘述的人物之一。而同故事敘述者則要複雜得多,因為在同故事敘述者中總是有兩個第一人稱人物——一個指親身體驗故事事件的第一人稱,另一個指敘述發生過的故事事件的第一人稱人物;甚至有時其中一個第一人稱敘述者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第三人稱的敘述者。帕爾默認為嵌入式敘述既可以用於第一人稱也可以用於第三人稱敘事小說。^⑤換而言之,與異故事敘事(第三人稱敘事)不同,在同故事敘事(第一人稱敘事)中,敘述者也是故事發生世界中的一個人物。因此,在同故事敘述中,敘述者的思想活動就常常會與故事中此人物的思想活動交織在一起。麥克尤恩在《愛無可忍》的開篇關於氦氣球事件的敘述中即採用了帕爾默的第一人稱同故事敘述,使得作為敘述者的喬的思想活動與作為小說故事中人物的喬的思想活動交纏在了一起。小說中人物喬的自我敘述與敘述者喬的敘述的交替出現,使得讀者一方面能與故事中人物喬同時體驗到氦氣球悲劇發生的突然性及其產生的混亂,同時又讓讀者認識到經歷創傷事件後的敘述者喬如何試圖通過他自己的、理性科學敘述來重建現實生活中的秩序以及他自己的男性氣質。

王悅在分析麥克尤恩的《立體幾何》(*Solid Geometry*)時曾指出在第一人稱敘事中,敘述時間與被敘述時間之間的時間差是產生不可靠敘述效果的關鍵因素之一。^⑥同理,在《愛無可忍》中,當敘述者喬開始復述經歷過的創傷性故事時,氦氣球事件已經發生。這其中的時間差決定了敘述者喬在復述時必然會帶有一種負罪感,而為了驅散這種負罪感,敘述者喬的敘述中不自覺地夾帶了一種有意的自我辯解。敘述者喬也正是在「多麼愚蠢啊,我拋棄了我們在苦欒樹旁那片鮮嫩的春日草坪上的幸福時光,飛快地奔進了這個錯綜複雜的故事裏」的感慨中開啟了對整個故事的敘述。^⑦自此之後,敘述者喬的敘述中自始至終瀰漫著這種冷靜、科學、理性的敘述口吻:

我想,在我們接觸前,當我們還在集合過程中的時候,我們始終保持了一種數學的優雅之美。我還在描述我們的分佈位置、相對距離和羅盤方位——因為就它們而言,這是我保持清醒的最後時刻,之後我就什麼也搞不清楚了。我們在奔向什麼呢?我想,我們所有人都沒有完全弄明白。^⑧(粗體自加)

這裏的「數學的優雅之美」成為敘述者喬為自我開脫和解釋的最佳例證之一,與此時喬的故作鎮靜形成強烈反差的是氦氣球悲劇即刻發生的緊迫感。考特尼(Hannah Courtney)也注意到了作為敘述者的喬和作為故事人物的喬兩者聲音的並置,並用熱奈特(G rard Genette)的「慢景」(slowed scene)進行瞭解讀。她認為「慢景」同時包含「小說人物意識和場景動作」,是麥克尤恩在他早期的21部小說中常用的技巧之一。這

些場景對聚焦人物來說通常是重要時刻,也通常是改變命運的創傷性時刻。^⑨慢景一方面拉長了動作的發生過程,同時又併入了此時此刻人物的思想活動,麥克尤恩借此在讀者和人物之間搭建了一座橋樑,敘述時間的拉長使得讀者有機會借此更深刻地體會人物的心理活動和變化,如同身臨其境。《愛無可忍》中,作為敘述者的喬使用第一人稱對已經發生過的事情進行敘述時,事件的即時性已經被自然地消解。在此,人物喬在悲劇發生時的直接思想活動被遮罩了,讀者被告知的僅僅是氦氣球事件給敘述者喬帶來的創傷性影響和改變。因此,對於「存在於過去時刻的人物喬」來說,故事的「暫時性敘述者喬」在此佔據的是第三人稱敘述者的位置,兩者之間因為創傷性事件的發生早已有有了天壤之別。^⑩

綜上可知,小說開篇關於氦氣球事件的嵌入式敘述與考特尼將事件「慢景」化解讀有異曲同工之妙,兩者都同時呈現了敘述者喬的心理活動和故事人物喬的親身體驗。否則,小說很難把敘述者喬將約翰·洛根的墜落解釋為「無情的地心引力」時的冷靜和故事人物喬親眼目睹洛根墜落時像「堅硬的黑色小棍」時的驚懼同時呈現在讀者面前——「我從未見過比這個墜落中的活人更恐怖的景象」^⑪。作為一種挑釁,敘述者喬在陳述整個事件時堅持的科學理性主義口吻(即在危難時刻是順從利己主義的本能還是堅持利他主義)很好地說明了喬力圖在道德悲劇前重塑秩序,以此來減輕自己罪惡感的企圖,「事後我們所感受到的痛苦證明,我們心裏清楚,我們已經辜負了自己。不過,放棄也是人的本性之一。自私同樣是刻在骨子裏的。這就是我們作為哺乳動物的矛盾所在」^⑫。嵌入式敘述由此使得作家有機會通過這種非正常敘事方式,即故事人物人生經歷的「慢景」呈現,來再現敘述者人生中的危急時刻。

二、多重聚焦及其對敘述者男性氣質的挑戰

《愛無可忍》不僅在開篇氦氣球事件中採用了嵌入式敘述,還通篇使用了多重聚焦。而多重聚焦為讀者呈現的其實是關於氦氣球事件的多種版本的敘述,其目的和實質是挑戰了敘述者喬關於悲劇事件的霸權式的男性敘述。

康奈爾(Raewyn Connell)早就發現了男性氣質中其實蘊含著某種性別政治,並把男性氣質分隔成四種類型,包括霸權、服從、合謀和邊緣化。其中霸權式的男性氣質在文化層面一直被推崇,是男權社會權力機制的核心,在「社會生活一直處於領導地位」;並持續對其他三種處於從屬和邊緣地位的男性氣質類型發揮領導作用。霸權式的男性氣質被冠以為男性氣質的「理想類型」,被認為體現了「現實性別關係的構造和外貌,蘊含了男權社會何以合法化的答案。這些目前廣被接受的答案又進而確保了(或被認為可以確保)男性的主導地位和女性的從屬地位」。^⑬這種霸權式的人物在麥克尤恩的作品中並不少見,包括《水泥花園》(*The Cement Garden*)、《陌生人的慰藉》(*The Comfort of Strangers*)、《愛無可忍》(*Enduring Love*)和《贖罪》(*Atonement*)等多部作品中,都能看到這類霸權式的人物身影。

小說人物傑德·帕裏在此無疑是一個追尋霸權式男性的代表。他成長於一個破碎家庭,早年父親過世,唯一的姐姐也在其母親過世後失聯多年。母親過世給他遺留的一筆財產和一棟房子使傑德辭掉了唯一的一份兼職工作,過起了隱退社會的生活。作為一名德·克萊拉鮑特病症(*de Clerambault Syndrome*)患者,傑德深信「自己正和一個社會地位高許多的人鍾情相戀,暗通款曲,是對方首先墜入愛河,是對方首先大獻殷勤」^⑭。傑德鎖定的愛慕對象是小有名氣、前/錢途光明的科普作家喬·羅斯。喬事業有成、家庭幸福,這

正是他得以被色情狂患者傑德「選中」為愛慕對象的原因。然而隨著故事的發展，來自傑德的敘述和他的存在卻給喬的事業和家庭帶來重重危機。首先，傑德突然而又強烈的「愛意」在喬和他的妻子克拉莉莎之間製造了猜疑、秘密甚至敵意。喬拖後了兩天才對克拉莉莎坦白他收到傑德的第一個「愛的電話」。稍後，喬一時衝動刪除了傑德的三十三個瘋狂的騷擾電話留言，而沒有了這些所謂的「證據」，喬對傑德的抱怨在克拉莉莎眼裏越來越成為喬變得神經質的一種「症狀」。不僅如此，喬一直以來引以為傲的寫作事業——為他帶來了財富、名聲甚至贏得了漂亮的妻子——也受到來自傑德的瘋狂情書的嚴重質疑。傑德對喬自以為是的科普寫作發起了強烈的攻訐，他甚至質問道：「誰會關心那種用在都靈裹屍布上的碳-14 年代測定技術呢？你以為人們在聽說它只是一場中世紀的騙局後，就會改變他們的信仰嗎？你以為信仰可以單靠一塊破布做支撐嗎？」¹⁵霍爾頓(Emily Horton)認為傑德是「一種甚至更為極端的霸權男性的代表，其身上的那種捉摸不定的佔有性傾向又加強了他對(別人)心理分析的欲求」¹⁶。

事實上，喬的男性氣質不僅受到色情狂傑德的挑戰，同時也受到他的親密伴侶克拉莉莎的質疑。小說中克拉莉莎寫給喬的信從另一個角度聚焦了喬的家庭和事業危機。在克拉莉莎看來，喬又重拾那份狂熱的「重返科學領域」的野心是為了逃避傑德的糾纏，而傑德的糾纏也僅僅是一種「症狀」，喬口中描述的傑德也許根本不存在，因為喬從未向她提供任何讓人信服的證據。傑德想像出來的「愛戀」某種程度上挑戰了喬和克拉莉莎之間的「正常」愛戀，同時也說明了傑德的愛雖然不切實際，卻也能持久。克拉莉莎通過她的「詩性」之眼看待/描繪世界的方式進一步說明了她和喬之間關係不再和諧的深層原因——喬也在稍後才意識到——他們之間真正問題在於沒有孩子以及他那份時不時想「重返科學領域」的那份躁動不安，更在於喬一直想擺脫那種一直纏繞他的那種「在科學領域是個失敗者，是個依賴於他人成果的寄生蟲和邊緣人」的不安感覺。¹⁷

克拉莉莎曾指出喬對基因科學的入迷使得他過於注重對細節的分析，而「容易失去對整體的把握」，並將所有的世界中的奇妙歸於進化論。¹⁸這也應和了克拉莉莎在最後的信件中提到的「儘管我是大錯特錯，但這並不單純地就意味著你都是對的」。¹⁹喬對「正確」、「理性」的執念正是對此的絕佳例證。一些評論家已經意識到了其中的問題所在，莫裏森就認為小說揭露了「一種危機……一方指享受特權的男性群體，一方指有關科學、醫學和法律的社會書寫，這些社會書寫一方面建構了這些男性的特權，另一方又使其陷於困境」。肖恩·馬修斯(Sean Matthews)也認為小說呈現了一種福柯式邏輯，敘述者喬的不可靠聲音意在「揭露的是他自身充滿理性、科學的自信的不足，以及理性自身的不足」。²⁰由於過度關注傑德，喬的理性中也帶上了一絲妄想狂似的敏感多疑和對他人行為的過度解讀。

除此之外，喬的反常還集中體現在他私自翻閱克拉莉莎的信件以尋找她不忠證據的魯莽行為中。在這裏，喬所謂的「社會本性使然」或「合理化解釋」——我要將克拉莉莎從她自己的錯誤想法中拯救出來……我要重塑我們之間的感情……我有權知道是什麼扭曲了克拉莉莎對帕裏的反應，是什麼阻止了她站在我這一邊——都成為喬公然侵犯她人隱私的無禮藉口。²¹喬的多疑和妄想暴露了他內心深處的男權意識，霍爾頓也認為喬以父親或拯救者的身份自居，目的是為自己對她人隱私的不合理侵犯尋找合理的依據，給自己的欲望(或自負)披上一層法律的效力。²²喬喪失自己的理性同時，也在逐漸丟失了他在克拉莉莎心中樹立起來的男性魅力。在傑德公然雇凶企圖射殺喬的企圖失敗後，敘述者喬更加清醒地認識到，他要獨自面對這次人生危機，靠他自己的力量拯救自己、拯救他與克拉莉莎的往昔之愛——克拉莉莎認為我瘋了，員警覺得我傻

乎乎的,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無疑的:讓我們重回往昔這一人物,將由我一個人獨自承擔了。²³以理性為傲的喬由此還從一群隱居的嬉皮士那裏購買了一把非法槍支,我們可以推斷,當理性無用武之地,當喬的男性霸權受到嚴重挑戰時,一直以來過著一種狹隘的生活、不認識任何壞人,也不認識任何參與有組織犯罪的壞人的喬,也被迫走向了以暴制暴的道路。霍爾頓對此也有類似的論斷,她認為喬購買槍支的行為更加明顯地暴露了喬的父權制思想,以保護克拉莉莎為藉口再次暴露了他的男權幻想。²⁴一方面無法從妻子和員警那裏得到他需要的支持和幫助,另一方面傑德的「愛情」執迷越來越頻繁,一種對未知暴力的恐懼使得敘述者喬開始幻想也能具有抗暴的能力,「我開始幻想自己需要帶什麼武器防身。催淚瓦斯?指節銅套?刀子?我成天做著暴力衝突的白日夢,夢裏獲勝的永遠是我……」²⁵沉浸於幻想出來的冒險情節中的喬,慢慢開始失去他理性的生活節奏,為了使自己的一切重回往昔的軌道,喬在不知不覺中走向了男性邏輯的極端。

三、克萊拉鮑特綜合症的科學書寫和霸權男性氣質的重建

很顯然購買槍支並不是敘述者喬為重建他的男性權威而採取的唯一行動,縱觀小說,敘述一直是喬用以宣示他在事業和家中權威的主要武器。謝淑芬在分析《贖罪》時就指出巧克力大亨保羅·馬歇爾正是霸權式男性的完美代言和典型代表,他的男性權威表現在他對金錢的聚斂、權力的操縱以及對女性的性佔有。謝還認為馬歇爾的男性氣質與商業和大規模資本聚積密切相關,正是基梅爾定義的「商界男性」的代表²⁶。而這種「商界男性」作為20世紀上半葉男性氣質的首要代表,慣常不斷地追逐財富和成功,通常又被定義為「沉迷於權力的男人,擁有權力的男人和追逐權力的男人」。²⁷對於敘述者喬來說,他的科學敘述成為他可以操縱的一種強大權力,助他擊敗他人、保衛自己的聲譽和社會地位。

很顯然喬的寫作天賦不僅為他贏得了巨大名譽和財富,也是他一直引以為傲的事情,「人們誇我有天賦,能將複雜的事物解釋清楚。在科學領域的許多重大突破背後,人們經歷了無數的挫折、反復和由於幸運而隨機獲得的成功,我則可以利用它們編寫出像模像樣的故事」。²⁸(粗體自加)顯而易見,小說中彌漫的恐懼感並不是因為喬感受到了任何物質方面的威脅,而是由於傑德的闖入觸發了一場更為深層的危機,即享有特權的男性主體與本應維護這種特權男性的社會敘事(包括科學、醫學和法律等)之間的衝突。備受傑德「愛慕」困擾的敘述者喬,在他確定了傑德的不正常行為的醫學依據時才最終松了一口氣:

德·克萊拉鮑特綜合症。這個名字就像一聲號角,一記響亮的小號聲,把我帶回自己的困擾中。這下子又有研究要做了,我已經完全知道該從何處下手了。綜合症是一套關於預測的框架,給人帶來慰藉……當我們四人走到屋外的磚石小徑上準備道別時,我幾乎感到自己心情雀躍,就好像我的老教授終於給了我那個研究崗位似的。²⁹

自此之後,喬對敘述的操控與他對傑德的德·克萊拉鮑特病症的執迷漸漸地融合在了一起。康奈爾曾解釋說,男性氣質不一定必須是個體的,也可以是集體的,商業圈、軍隊以及專制政府都是很好的代表。³⁰不應忽視的是在《愛無可忍》中,敘述者喬曾多次嘗試把傑德來信中的語言進行摘錄、重組,整理成一份可以說明傑德有採取暴力行動的犯罪檔案,並以此向警局申訴傑德對他採取的人身騷擾和意圖謀殺罪。因為喬非

常明白要想警局注意他的申訴就必須得走「官僚主義那一套」,「帕裏的行為得被歸納為一種犯罪」,被「整合為一種可辨認的大眾形式」,只有這樣才會引起警局的注意和法律的保護。³¹當喬埋頭於傑德那充滿暗示和邏輯不通的信件,企圖將它們剪裁、拼貼成一份有威脅含義的敘述文檔時,其行為無疑暴露了「傑德的神經性行為與喬自我意識中隱藏的過分躁動與妄想之間的共生性」。³²

基梅爾指出員警和軍事化管理的醫院這類「機構力量」和「組織結構」都帶有霸權特質。霸權式男性氣質則被轉化為那些「掌握權力的男性形象」。³³員警就是權力的具體化身,對社區執行管束、壓制和規範化的職責。處理喬的申訴信的林利和華萊士警官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們先是以傑德「沒有觸犯法律」為由擱置了喬的第一次申訴,後又通過反復錄口供否定了喬關於傑德謀殺未遂的指控。所幸在小說的最後,警局最終確認了傑德的危險和犯罪行為,不僅解除了喬的人身危險、為他保住了最後一絲男性尊嚴,同時也維護了法律體系的話語權威。

小說更具顛覆效果的是其開放式結尾,麥克尤恩再次將互相矛盾的敘述話語並置,將理性的決定權交由讀者手中。小說的結尾,麥克尤恩附錄了一份載於權威雜誌《英國精神病學評論》中一篇有關德·克萊拉鮑特綜合症的病例報告,分析的正是小說中的色情妄想狂帕裏·傑德所患病症。附錄文章中的權威醫學科學話語一方面似乎為小說提供了一個安全的結尾,另一方面,這份醫學已被認可的文獻又轉而為小說的敘述提供了認識論上的支撐,使得小說中喬一直固守的男性權威得到了現實中的認可和支持。作為讀者再重新回顧這份科學文獻時,作者麥克尤恩的意圖已不言自明,即在科學的合法化話語內,「「正常」的男性氣質和敘述標準作為享有特權的表達模式受到了保護」。³⁴霍爾頓將附錄一中的精神病案例分析嘲諷為「科學的極致說教,缺乏人文學科的關照,從而削弱了文獻的權威性」。小說由此發揮了「調查的作用」,探討的是文學與科學兩種不同文化的「交接面」以及兩者各自的優勢和劣勢。³⁵

總之,傑德需要首先被納入犯罪的、抑或精神異常的社會規範/敘述範疇以內,然後才能被員警拘禁或者精神病院收留。小說一定程度上講述的正是喬依靠自己書寫故事的能力、將傑德編寫進相關社會規範/敘述範疇的成功範例。然而,敘述者喬在試圖書寫傑德的不正常時,也暴露了自我的偏執和妄想症傾向。王悅曾指出現代主義小說敘事藝術的一大特徵就是大量使用不可靠敘述。和傳統的敘述方式不同的是小說的敘述主體不再持有統一的價值觀,敘述者也不再是作者意圖的唯一代言人。這些來自隱含作者、敘述者和小說中人物的不同聲音深化了作品的內在矛盾,增加了作品的內在張力。³⁶《愛無可忍》中不可靠敘述的內涵早已超越了韋恩·布斯(Wayne Booth)的最初界定。儘管敘述者喬的敘述聲音自始至終以權威口吻自居,但其權威性卻不斷受到故事人物喬的敘述,以及色情妄想狂傑德和人文主義學者克拉莉莎的聚焦敘述的挑釁。不可否認,喬一直試圖通過他作為敘述者之口以及他的科學敘事/書寫來化解他的人生危機、重建他的男性氣質,但來自傑德和克拉莉莎的敘述曾一度極大地挑戰了他的企圖。

當然,麥克尤恩作為英國的「國民作家」、現代社會的代言,其目的遠不止於此。霍爾頓就敏銳地指出麥克尤恩的寫作技巧一方面再現了現代科學的矛盾和複雜,同時將不可靠敘述與小說的自覺意識結合起來,指向地是對後現代主義意識形態的一種批判。³⁷由此,以批判的態度重新審視現代社會的科學狂熱,麥克尤恩在其作品中再次探索了當代大眾科學是否有能力詮釋現代社會中的不確定性,抑或能否在混亂中重建理性秩序。

注釋

- ① 黃一暢:《創傷記憶的敘事變形——〈愛無可忍〉的不可靠敘述》,《外國語文》,2015年第2期,頁56-60。
- ② Matthews, S. (2007). Seven types of unreliability. In: Peter Childs (ed.). *Ian McEwan's Enduring Love*. London: Routledge, 91-106.
- ③ Head, D. (2007). *Ian McEwa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40.
- ④ 劉春梅:“What Do You Really Want”: A Study of Mind-Reading in Ian McEwan's *Enduring Love*, 杭州:浙江工商大學,2014。
- ⑤ Palmer, A. (2004). *Fictional mind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4, 26.
- ⑥⑩ 王悅:《析麥克尤恩〈立體幾何〉:不可靠敘述的生產與闡釋》,《外國文學》,2010年第1期,頁16-22。
- ⑦⑧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伊恩·麥克尤恩(著),郭國良、郭賢路(譯):《愛無可忍》,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版,頁1-291。
- ⑨⑩ Courtney, H. (2013). Narrative temporality and slowed scene: The interaction of event and thought representation in Ian McEwan's fiction. *Narrative*, 2, 183-185+188.
- ⑬⑳ Connell, R. (2005). *Masculin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77.
- ⑯⑰⑱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Horton, E. (2013). Reassessing the two-culture debate: Popular science in Ian McEwan's *The Child in Time* and *Enduring Love*. *Modern Fiction Studies*, 4, 705-707+689.
- ㉞ XIE Shufen. (2016). The “Conscious absence” and “virtuoso presence” of hegemonic masculinity — Deciphering Ian McEwan's atonement. *Overseas English*, May, 137-144.
- ㉟㊱ Kimmel, M. S. “Masculinity as homophobia: Fear, shame, and sil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identity”. In Zhan Junfeng (ed.). (2010). *A theoretical reader in male identity*, Wuhan: Wu Han University. 157-192.
- ㊲㊳ Morrison, J. (2003). Narration and unease in Ian McEwan's later fictio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 169, 253-270.

(Editors: Joe ZHANG & JIANG Qing)